



一諾千金： “小康社會”目標的提出

小康社會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追求的理想社會狀態，寄託著中國人民對幸福美好生活的憧憬和願望。近代以來，隨著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生靈塗炭，民不聊生，小康生活成了中國人民求而不得的奢望和夢想。一批先進分子以拯救民族危亡為己任，開始探索讓中國擺脫貧困落後，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正確道路。

1.

初心：為中國人民謀幸福

鴉片戰爭後，由於列強的入侵和封建統治的腐敗，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山河破碎，生靈塗炭，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難。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苦難生活

帝國主義列強的侵入，西方資本主義的掠奪，加速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逐步解體。雖然在此期間民族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展，但速度緩慢、力量軟弱。因此，近代中國始終處於帝國主義列強的爭奪和控制之下。以交通大動脈——鐵路為例，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13040.5公里鐵路中，帝國主義列強以各種方式控制經營的有11996.5公里，佔92%。其餘投資、關稅、租界、駐兵、領事裁判等特權更不勝枚舉。同時，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對農民的剝削依舊在中國的經濟社會生活中佔據支配地位，軍閥割據和連綿不休的戰亂，更讓人民困苦日甚一日。

在美國農民人均年產糧食兩萬公斤的時候，中國僅為1400公斤。在這樣低水平的農業生產率下，農民還要承擔50%—70%的地租，剝削之重世所罕見。當時一次關於北平（今北京）郊外鄉村的社會調查顯示，100戶家庭中，全年吃白麵在五次以下的約佔半數，其中不少僅在過年時吃一次。吃五至九次的佔1/10，每天都吃得起白麵的一共五家；大多數的家庭只在過

年、端午、中秋買些肉吃，其中不乏全年只在過年時吃一次肉的，其他時間吃得起肉的不過三兩家，也不能買多少；全年用於購買水果的費用，平均每家的四角錢，夏天荸薺、藕，冬天柿子、黑棗，吃不起其他水果。這還是生活水平好於一般農民的城鄉結合部的情況。涉及 22 個省、168 個地區的《中國土地利用》調查顯示，廣大農村人口的食物中，幾乎沒有牛奶，一個男子一年平均消費 8.35 個雞蛋，蛋白質、鈣的攝入量遠遠少於西方。即使僅以食品開支衡量，中國農村絕大多數人民也基本上處於勉強度日和絕對貧困狀態。

就是這樣勉強度日的生活，也常被災荒、戰亂打破。20 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幾乎是無年不荒、無處無災。以 1920—1924 年五年間為例：1920 年，北方五省發生 40 年未遇的大旱，災民近 2000 萬；甘肅海原（今屬寧夏）發生 8.5 級大地震，死亡 20 餘萬。1921 年，江蘇、安徽、河南、山東、直隸、陝西、湖北、浙江八省大水。1922 年，河南 70 餘縣遭遇旱蝗，湖北先澇後旱，安徽、江蘇、河南、山東等省上年水災之地發生荒歉，江蘇、浙江、安徽三省水災災民逾 1200 萬。1923 年，18 省水災，初時各省水淹溺亡者便逾萬人，受災者 2027 萬餘人；同年陝西大旱，赤地千里，竟至易子而食。1924 年，16 省區發生水災。

旱澇、饑荒、疫病、戰亂，20 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從南到北，到處都有人流離失所，衣不蔽體，食不充飢。1928 年北平社會調查部發布的《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記載，湖南中部的農民“衣服僅足蔽體，料子係極粗老棉布。農民衣褲常補綴甚多，終年赤足，只有到人家拜年時，始穿一雙鞋襪。一、二天後復收而藏之，預備明年此時之用”。1931 年陝西北部流行鼠疫，據統計死亡人數約在 10 萬—20 萬人之間。當時中國傳染病死亡率為 72%，是人口死亡的最重要原因。不少災民為了求得一線生機，外出逃荒。

但僅據 1935 年 11 月、12 月兩個月間天津《大公報》的報道統計，天津倒斃街頭的無名乞丐便有 600 名之多。當時北方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尚且如此，其餘各地災民、乞丐的命運可想而知。當時中國的人口死亡率為 25‰，嬰兒死亡率為 200‰，產婦死亡率為 15‰，平均期望壽命僅為 35 歲。

生計已經如此困窘，更談不上教育子女，籌謀未來。當時中國每萬人中只有小學生 189.52 名，中學生 5.05 名，大學生 0.54 名。同一時代的日本，這三個數字則分別是 1939.17、567.27 和 21.44。

為了結束這樣苦難的生活，為了擺脫經濟文化落後的局面，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奮力抗爭，在迷霧中苦苦尋覓強國富民的新道路。

為中國革命指明方向

1921 年夏，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從此，苦難沉重的中國人民開始掌握自己的命運，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鬥爭有了主心骨、領路人。

在 20 世紀初的中國，一個新政黨的成立不算新鮮。1911 年至 1913 年，各種新興團體有 600 餘個，其中具備近代政黨性質的有 300 多個。但正如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所指出的：中國共產黨“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並堅持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這個目標。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的第一個綱領明確提出：我們黨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要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並以實行社會革命作為自己的根本政治目的。



位於今上海興業路 76 號的中共一大會址（新華社記者劉穎 攝）

為什麼要革命？毛澤東的回答擲地有聲：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

要實現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志願，一個重大的任務就是盡快制定出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綱領。為此，就要了解中國的客觀的實際情形，就要像李大釗所說的那樣“打起精神來，尋著那苦痛悲慘的聲音走”，才能“曉得痛苦的人，是些什麼人？痛苦的事，是些什麼事？痛苦的原因，在什麼地方？要想解脫他們的苦痛，應該用什麼方法”。

28 歲的毛澤東換上粗布短褂，穿著草鞋，在紗廠、印刷廠、黑冶煉廠結交工人朋友，發展黨員；27 歲的鄧中夏在長辛店辦起了勞動補習學校，日班教工人子弟，夜班教工人；24 歲的周恩來組織起了旅歐中國共產主義

青年團，在華工和勤工儉學的學生中常能看到他們的身影；27歲的向警予在上海平民女校教課，和南洋煙廠的女工唐景、陳倩如成了朋友，發展她們加入了共產黨……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捨棄了輕鬆的生活、豐厚的收入，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扎進工礦廠房、田間地頭，尋著苦痛悲慘的聲音，探索為千百萬人民謀幸福的方法。

1922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發表對於時局的主張，明確指出“因為民主政治未能成功，名為共和國家，實際上仍舊由軍閥掌握政權，這種半獨立的封建國家，執政的軍閥每每與國際帝國主義互相勾結……軍閥政治是中國內憂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並提出“取消列強在華各種治外特權”“沒收軍閥官僚的財產，將他們的田地分給貧苦農民”“定保護童工女工的法律及一般工廠衛生工人保險法”“實行強迫義務教育”。

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在大會宣言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讓在黑暗中摸索了許久的人們認清了革命的對象和鬥爭的目標，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大會一同提出的，還有改善人民生活的大聲疾呼：

1. 改良工人待遇：(甲)廢除包工制，(乙)八小時工作制，(丙)工廠設立工人醫院及其他衛生設備，(丁)工廠保險，(戊)保護女工和童工，(己)保護失業工人……等；

2. 廢除丁漕等重稅，規定全國——城市及鄉村——土地稅則；

3. 廢除釐金及一切額外稅則，規定累進率所得稅；

4. 規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

5. 廢除一切束縛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權利；

6. 改良教育制度，實行教育普及。

工時、保險、教育……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種種細節，讓被壓迫了上千年的中國人民感受到了這個“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為窮苦大眾謀幸福、救中華大地出水火的一腔赤誠。

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

剛剛成立一年，尚不足 200 人的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議決案中鄭重宣示：我們共產黨不是空談主義者，不是候補的革命者，乃是時時刻刻要站起來努力工作的黨，乃是時時刻刻要站起來為無產階級利益努力工作的黨。

在帶領廣大人民開展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艱辛實踐中，中國共產黨用實際行動踐行了自己的承諾。

1928 年 12 月，湘贛邊界特委公布了毛澤東總結農村革命根據地土地革命經驗制定的井岡山《土地法》，用法律的形式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肯定了農民分得土地的神聖權利。贛西南開展土地革命後，農民“不還租，不還債，不完糧，不納捐稅，工人增加了工資，農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種枷鎖，個個都喜形於色”。

1931 年，以江西瑞金為中心的贛南、閩西大地上，建立起一個嶄新的“廣大被剝削被壓迫的工農兵士勞苦群眾的國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頒布了勞動法、土地法，採用了八小時工作制，並另外頒布了許多有利於士兵、貧民、青年、婦女的法律，群眾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以興國縣長岡鄉為例，1933 年時，“衣增一倍”，“吃肉，貧農增一倍，工人增二倍”；全鄉設四所列寧小學，每村一所，學生共 187 人，佔全鄉學齡兒童總數 65%；全鄉設九所夜學，“學生平均每校約 32 人”，“全鄉 16 歲至 45 歲的青年壯年

共 413 人，大多數進了夜學”。長岡鄉的老百姓說：“紅軍共產黨什麼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員真正顧樂（愛惜）我們！”

全民族抗戰時期，由於水、旱、蝗、雹等自然災害和侵略者的“掃蕩”，根據地經濟形勢日益困難。中共中央以“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為總方針，開展大生產運動。陝甘寧邊區黨政機關、部隊戰士、領導幹部一起動手，開荒、種糧、紡線，減輕根據地人民負擔。邊區農民所交的公糧，從 1941 年佔總收穫量的 13.58%，降至 1943 年的不足 9%。1943 年以後，敵後各根據地的機關一般能自給兩三個月甚至半年的糧食蔬菜，人民的負擔佔總收入的 14% 左右。而在抗戰勝利後陝西的國民黨統治區，僅田賦一項負擔即佔去每畝收穫量的 14%—25%，此外還有徵實、徵借、省縣公糧、“綏靖”公糧，再加上抓丁、雜稅以及名目繁多的“自衛特捐”、富戶捐、被褥費、工具費、保公所麥、鄉公所麥……一般農民收入的絕大部分甚至全部均被搶去，年年揭借，生活痛苦不堪。

“領導農民的土地鬥爭，分土地給農民；提高農民的勞動熱情，增加農業生產；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發展對外貿易；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正像毛澤東所指出的，“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成立之初僅有 50 多人、赤手空拳的中國共產黨，以為人民謀幸福的真摯初心和實際行動，團結起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全國解放戰爭……28 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鬥，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在實踐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勝利的道路，把被人視為“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團結和凝聚成萬眾一心的不可戰勝的力量，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

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迎來了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自身解放鬥爭的勝利。

1949年10月1日，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結束了百餘年來中華民族遭受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壓迫與剝削的歷史，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被壓迫、被奴役了上千年的勞動人民，被欺辱、被蔑視了一個世紀的中國人，終於成了自己國家的主人，中華民族以嶄新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歷史開始了新的紀元。這是偉大的中國人民走向繁榮昌盛的開始，為自己創造文明與幸福的開始。

